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瑞士〕西斯蒙第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 務 中 書 館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著 何钦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 4017·84

1964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5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374 千

印数 10,500 册

印张 17 5/8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 1.95元

60673/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評西斯蒙第的《政治 經濟学新原理》

林 森 木

(一)

让·沙尔·列奥納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学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出生于瑞士的法語居民居住区，属于法国学者的行列。在經濟学說史上，西斯蒙第处于特殊的地位；他是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創始人和法国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完成者。《政治經濟学新原理或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出版于1819年，这本书是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濟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西斯蒙第恰好生活在大机器工业在欧洲大陆刚刚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欧洲資本主义經濟迅速地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国大革命消灭了封建残余以后表现得特別明显。尽管封建統治階級为了自身的利益，竭尽全力企图阻止这种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欧洲出現政治反动的局面下，資本主义仍然在胜利地前进。在欧洲各国中，資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洪流不断地冲击着封建主义制度的基础。

資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也就是大生产对小生产的胜利。資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摧毁着封建主义的經濟基础，也瓦解着和排

挤着小商品生产；资产阶级的胜利不仅推翻了封建贵族，也使中世纪的小市民和小农处在动荡和不断破产的境况之中。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商品生产者，即小资产阶级。但是，竞争经常把这一阶级的成员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只有其中的少数人发了财上升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因此，小生产者开始觉察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很快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们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員所代替。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反映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理论家。西斯蒙第就是这方面的头面人物和典型表述者，他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系统地论证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小资产阶级是过渡性的阶级，处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地位，使得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劳动者，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它贫困和破产，因而倾向于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私有者，倾向于资产阶级。西斯蒙第的《新原理》充分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地位和两面性。

《新原理》的作者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上深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影响。和斯密以来的一切古典经济学家一样，西斯蒙第在价值学说方面承认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原理；在关于剩余价值的问题上，把利润和地租看为是工人劳动产品的扣除，是额外价值；在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方面，接受“斯密的教条”，认为年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收入，抛弃了不变资本部分。但西斯蒙第处于当时的主要思

潮之外,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资本主义大企业经济及其维护者。

在《新原理》中,西斯蒙第否认自由竞争具有无限优越性的说法,指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资本主义矛盾和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合理的自然制度,并具体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①这就是说,李嘉图虽然意识到工资与利润对立、利润与地租对立,但他认为这是自然的现象;而西斯蒙第则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的问题。

西斯蒙第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他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刺激生产力和财富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又限制着这种发展。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矛盾,商品和货币间的矛盾,买和卖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矛盾也将发展。他还觉察到这样一种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和财富的无限发展,另一方面劳动群众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他看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它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必然结果。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把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西斯蒙第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

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①

西斯蒙第为了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指责资本主义的发展，抨击“后果严重的竞争”。但是，对于这一切，他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量。他用独立的小生产，即农村中的农民自然经济和城市中的手工业，来反对资本主义；斥责资本主义破坏了小生产者的有保障的生活，妨碍了他们之间互相接近，即手工业者接近消费者，农民接近和他平等的农民；颂扬小生产保证了生产者的独立性和没有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

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没有试图去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起源、发展和趋势，他把它们看为是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看为是学说和政策、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同时，他也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过程。他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希望用别种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他希望依照资本的比例来调节收入，或依照生产的比例来调节分配，以此来消除矛盾。他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这是一种为小生产所特有的“正确比例”），又要保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因此企图把中世纪的行会和宗法制的原则和思想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里来。

西斯蒙第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而把独立的小生产看为是自然制度。他不懂得资本主义大生产和独立的小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懂得这是商品生产的两种形式。他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最发达的形式，而把小生产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萌芽形式捧上了天。他不了解他所偏爱的农民小生产者和手工业者实际上已经成为小资产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285页。

典作家们正是根据这一点,评定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指出他的观点是“反动的”。

说西斯蒙第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决不是说西斯蒙第维护落后的小资产者,同情小店主的自私自利的心理或阻止社会发展、向后倒退的愿望。西斯蒙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维护他们,他想站在一般劳动阶级的立场,他表示自己同情这些阶级的代表,例如他因工厂立法而感到高兴,他攻击资本主义并指出它的矛盾。这些术语只是说明西斯蒙第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和眼光是狭隘的,因而他所选择的达到一个十分美好的目的的手段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它只能满足小生产者或为复古主义者服务。

马克思在说明把不同作家的理论归结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时指出:“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①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2页。

(二)

西斯蒙第开始从事經濟學著述活动时，是英国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信徒。他在1803年出版的《論商業財富》一书中，介紹和闡述了斯密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的基本觀點。但在寫作《新原理》一書時，西斯蒙第已經成為英国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反对者了。對於這種變化，他自己是这样認識的：“自从我写了《論商業財富》以后，已經十五星霜，在這期間，我很少閱讀政治經濟學著作；但我並沒有停止觀察事實。有些事實我覺得與我所採取的原理大相徑庭。但是，当我把自己的原理向前推進一步的時候，我就能區別和分析這些事實了，一切都迎刃而解。我越往深處鑽研，就越相信我對於亞當·斯密的學說所作的修正是必要和正確的。”（第一版序）

西斯蒙第這種變化的根源當然不是由於對事實的觀察，和他同時代的英国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也對事實作了觀察，但从同一事實所得出的結論却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對立。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兩人的階級立場不同，所持的觀點不同。李嘉圖和斯密一樣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認為資本主義是自然制度，把工人階級的存在看做一種不言而喻的事實。他發展了斯密的理論，完成了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西斯蒙第則和他們不同，他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認為小生產是自然制度，強調小生產者的破產過程，即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因此，他“修正”了斯密的理論，創立了政治經濟學中的小資產階級流派。

西斯蒙第之所以把自認為是有獨特見解的政治經濟學著作稱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說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濟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濟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濟生活應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應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濟学不应该只考察財富，而應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應該属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摺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濟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應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把政治經濟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應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濟学的真正对象應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應該通过政治經濟

學使全体居民都能获得物质上的享受。

从这种見解出发，西斯蒙第給政治經濟学的对象下了一个定义：“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們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經濟学的对象。”（本书第 22 頁）这个定义表明了西斯蒙第把社会經濟发展过程看作是由国家調整和指导的过程，把政治經濟学和国家的政策混为一談。他在《新原理》中不是、或者說主要的不是說明社会經濟生活的內在联系是什么样的，而是孜孜不倦地告訴人們社会經濟生活應該什么样和不應該什么样，政府應該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干預經濟生活，以保证居民的物质福利。这样一来，政治經濟学就不是一門研究經濟現象的內在因果关系的科学，而是研究人們从事經濟活动和政府干預經濟生活所應該遵循的准則。

西斯蒙第強調政治經濟学應該研究人，應該研究人的需要。他把人的需要作为經濟生活應該遵循的准則，同时責难李嘉图忽視人的需要，不注意消費，过于沉迷于抽象，把政治經濟学变成了一門思維推論的空論；說“他們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論而牺牲了人和現實利益”（本书第 527—528 頁）。西斯蒙第证明人的需要的存在，这使他比狹隘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高明得多。但是，他所說的人不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人，不是階級，而是抽象的人。这种人只存在于西斯蒙第的想像里，是被他美化了的小資產者。西斯蒙第正是依据这种人的需要，把它看成是正常的自然的东西，是应当存在的東西，并要求現實經濟生活符合于它。

因此，西斯蒙第不去科学地分析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而是用小生产者的需要和願望作为評述社会生活的准則，只是訴諸道德和感情。按照他的說法，政治經濟学不是單純計算的科学，而

是倫理道德的科學，只有注意到人們的情感、需要和熱望時，它才能達到目的。他寫道：“一般說來，亞當·斯密對待科學的態度是有些過分拘泥於計算數字，然而從全面來看，科學既屬於感性又屬於想像，感性和想像是不需要什么數字的。”（本書第46頁注①）又說：“我認為必須反對一般的、往往是輕率的、往往是錯誤的評判社會科學著作的方法。社會科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比各種自然科學問題複雜得多；同時，這種問題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樣。”（本書第13頁）其實，他在一切重要問題上，小資產者的“良心”總是戰勝經濟學家的“理智”的。

西斯蒙第指責李嘉圖的方法過於抽象，但他自己的研究方法不僅和李嘉圖一樣也是過分抽象，缺乏歷史觀點，而且具有明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指責李嘉圖迷戀於抽象的議論，其實是指責他的客觀主義，即指責他從現實生活出發而不顧人們的主觀願望。

西斯蒙第從人（小資產者）的主觀願望出發，把過時的東西當作自己學說的標本。作為他的研究對象的人首先是消費的實體，這種人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來進行生產，因此生產是有限的，它要由消費來決定。生產、收入、人口以及消費之間都有一定的比例，它們的增長必須成相等的比例。這樣一種為小生產所特有的“正確比例”，正是《新原理》的立足點。

在這裡，西斯蒙第突出了人的需要，即消費，要求生產去適應消費。他把消費提到了首要地位，而不是把生產提到首要地位。所以，他反對李嘉圖的為生產而生產的思想，強調生產是為了消費，指責李嘉圖的見解是為了手段而犧牲目的。如果說李嘉圖首先是一位生產經濟學家，那末西斯蒙第首先是一位消費經濟學家，他以

消費占優先地位的思想作為基本原則來闡述政治經濟學。

西斯蒙第在談到自己寫作《新原理》的基本思想時，這樣說道：“我要闡明的是：財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質享受的標志，我們就應該使它給所有的人帶來幸福；我們必須使財富的增長跟人口的增加相互一致；在這些人口之間進行財富分配時必須按照這樣一個比例，即如果沒有特大的天災人禍，他們不會為生活所苦。我認為，為了謀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須和資本一同增長，人口不得超過他們賴以生活的收入，消費必須和人口一同增長，而再生產同進行再生產的資本之間以及同消費它的人口之間都必須成相等的比例。同時，我要指出……每當這個或那個比例關係遭到破壞時，社會便陷入浩劫之中。”這本書“就是根據這種比例關係寫成的”。（第二版序）

所以，《新原理》的任務無非是描述西斯蒙第嚮往的理想世界，對照一下現存社會是否和它一致，指責資本主義制度怎樣破壞了各種應有的比例關係，呼籲政府調節經濟生活以保護居民擺脫競爭的後果。儘管西斯蒙第也曾主張政治經濟學應該建立在實際經驗、歷史和觀察的基礎上，實際上他只是把他的理想世界和現存社會相對立，迴避了對現存社會進行科學的分析，以小資產階級的道德規範和說教來款待《新原理》的讀者。他給政治經濟學帶來了小資產階級局限性和浪漫主義。

（三）

從西斯蒙第把《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一書又叫做《論財富同人口的關係》，就可以看到這本著作要說明生產和消費間的關係。他

认为在商品交换的社会里，生产需要資本，消費则需要收入去购买生产品。因此，在他看来，为了說明生产和消費間的关系，必須說明資本和收入間的关系。

西斯蒙第曾試圖闡明資本和收入間的关系，把自己对这种关系的解釋作为《新原理》一书的特征。他声称資本和收入間的区别对于社会是极重要的，把它們混淆起来是錯誤的，而要区分社会資本和社会收入又是十分困难的。他有保留地說：这就“接触到政治經濟學中最抽象和最困难的問題了。在我們的概念中，資本和收入的本性往往錯綜在一起。我們看到，对于一个人是收入，对于另一个人則是資本，同样一个东西一轉手就具有不同的名称”（本书第 63 頁）；就是說，时而称为“資本”，时而称为“收入”。西斯蒙第所說的困难实际上是这样的：对个别企业主來說收入是他用来购买消費品的利潤（不用于积累的那一部分利潤），对于个别工人來說收入就是他的工資，然而社会收入并不是这两种收入簡單的总和。因为那些生产机器之类的企业主和工人的产品不能当作消費品，只能用作資本；这些产品对其生产者來說收入（补偿利潤和工資），对其购买者來說則成了資本。

西斯蒙第虽然想从社会角度区分資本和收入，但他的思路十分混乱，对于困难感到一筹莫展。他仅仅指出了困难，当他一接触到問題的所在，就迴避了困难。在有些地方，他曾接受斯密的說法，断言从社会角度看資本是生产資料，收入是消費品；但他和斯密一样，並沒有把这种見解貫徹始終。因此，西斯蒙第企图从社会角度区分資本和收入的嘗試是失敗的，对于說明社会資本和社会收入間的关系沒有做出貢獻。

和許多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后繼者一樣，西斯蒙第也接受了亞當·斯密的錯誤見解，認為社會年生產產品的全部價值只分解為工資、利潤（其實就是利潤和地租）。他寫道：“總之，國民收入和年生產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產在一年中消費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費，他們以自己的勞動來交換，從而把勞動變成資本，並且再生產勞動；另一部分由資本家消費，他們以自己的收入來交換，從而把收入消耗掉。”（本書第 75 頁）他完全忽視了這個問題：既然生產需要資本（確切地說是需要生產資料），那末年生產怎麼能夠以收入形式被工人和資本家全部消費掉？他拋棄了生產資料（不變資本）的部分，也就使自己無法正確地了解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不過，他企圖把社會年產品的價值分解為收入的見解，和社會收入與國內市場的學說、和資本主義社會產品的實現問題聯繫在一起，指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危機的必然性。

西斯蒙第從社會年產品的價值僅僅分解為收入的見解出發，得出結論說：生產應該適應消費，生產應該由收入來決定，生產只要不再獲得收入就會停止。他說：“收入是從再生產中來的；但生產本身還不是收入，因為生產只有在實現之後，只有在每一件產品找到需要它或享受它的消費者……之後，才能獲得這一名稱，才能具有這種性質。”（本書第 84 頁）由於西斯蒙第把收入與生產（即所生產的一切東西）看為是一樣的，也就把實現與個人消費看為是一樣的。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商品僅僅是以收入來購買，今年生產出來的商品是以上一年的收入來購買的，因此今年的生產要由上一年的收入來決定。至於積累（把收入轉化為資本）或擴大再生產，他認為只能逐步地實現。“假如生產逐漸增長，每年的

替換就只能使人們每年遭受一些輕微的損失，同時却能為將來改善條件。假如這種損失很輕微而又分担合適，每個人都會毫無怨言地承擔這種損失。”（本書第 84 頁）

西斯蒙第一再強調生產必須適應消費，并把矛頭指向自己的論敵李嘉圖，指責他一味鼓吹無限制地發展生產，想給國家開辟致富之路，結果卻把國家推向破產。

在《新原理》中，西斯蒙第闡述的主要學說是隨着生產的增長，收入按比例減少。他把這個主要學說建立在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對立上，認為由勞動時間構成的價值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矛盾的根源。

西斯蒙第接受了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的見解，承認商品的交換價值必須由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勞動量來決定的原理。他進一步指出，並不是一切勞動耗費都是創造交換價值，都能增加財富的；只有為社會所必要的勞動耗費，只有在增加必要勞動的條件下，才能生產交換價值，才能增加財富。他把必要勞動歸結為全社會的需要和滿足這種需要的勞動之間的比例；換句話說，他所說的必要勞動不是由一定社會在一定時間內所有的平均勞動強度和平均勞動生產率來決定，而是要由滿足社會需要所必要的勞動量來決定。

西斯蒙第的這種見解，一方面強調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必須是得到社會承認的，必須是社會所需要的，從而正確地指出了創造價值的勞動的特殊社會性質，并把價值量歸結為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曾肯定西斯蒙第的上述看法是對勞動價值論的貢獻。另一方面，西斯蒙第把需求和勞動間的